

私信中的汪曾祺

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

随园诗话卷十二 三 戴 余泊舟高邮 桑

楚人徐芳湖 沈少谷 吴 傅 事 振 振 文 遊 臺

是 宋 改 年 老 少 游 定 園 四 人 遙 遊 屏 上 有

樓 村 詩 云 落 日 倒 懸 雙 塔 影 晚 風 吹

散 萬 家 烟 火 真 是 上 卷 景

以 宋 蘇 軾 中 似 未 知 未 終 詩 忘 時 似 有 宋 六

樓 村 詩 云 落 日 倒 懸 雙 塔 影 晚 風 吹

陆建华◇著

私信中的汪曾祺

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陆建华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321-4108-1

I. ①私… II. ①陆… III. ①汪曾祺(1920~1997)—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7070 号

责任编辑:林雅琳

封面设计:王志伟

私信中的汪曾祺

——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

陆建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194,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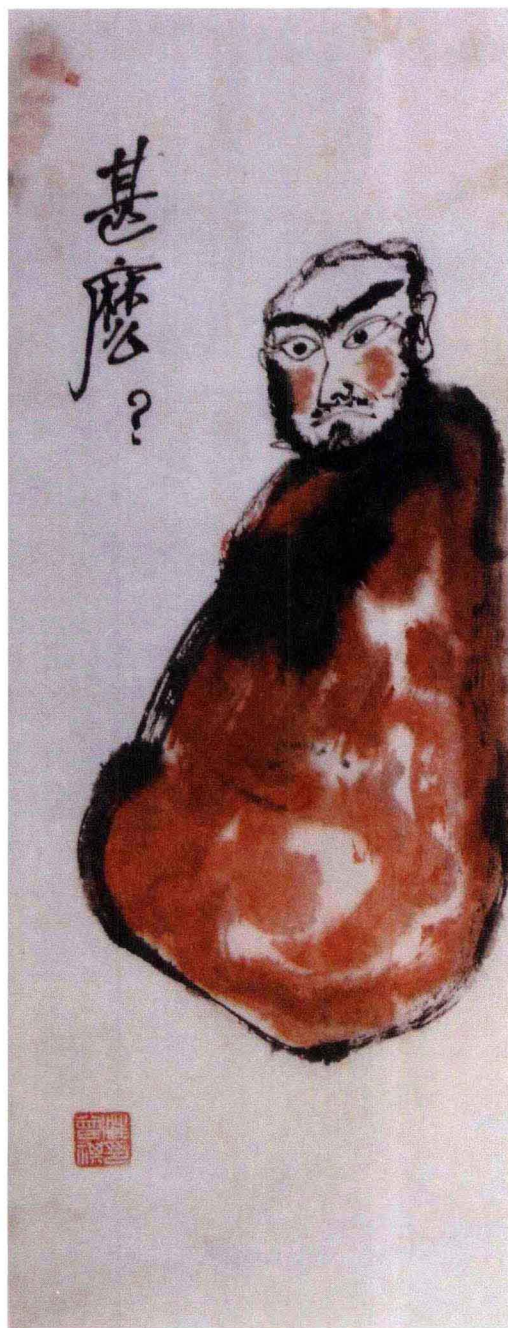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21-4108-1/K · 321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1993年10月，四卷本《汪曾祺文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将刚出厂、尚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样书送到汪曾祺手中，汪曾祺高兴地说：“编一个文集，就算到了一站吧。”图为汪曾祺手捧文集与作者边看边聊。



汪曾祺绘画作品

序

文/江曾培

有句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支持他的女人。同样，一个成功女人，背后也离不开支持她的男人。相濡以沫的夫妻，他是她的“一半”，她是他的“一半”，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成功的“军功章”，有他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实际上，不仅是夫妻伴侣，任何人的成功，都离不开他人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人是社会性的，是不能离群索居的。人在事业上的成功。固然基于本人的勤奋、智慧和才华，但同时也是他人帮助扶持的结果。跌倒时，没人扶；困难时，没人帮；迷惘时，没人助，前进时，没人推；完全靠个人的摸爬滚打，在崎岖的人生之路上，是难以成功达到峰巅的。一个人在走向成功的旅途中，背后站着支持的，不是像夫妻那样，是特定的“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是有着多个男人和女人。不过，这其中，往往有一个或几个在关键时刻或关键问题上给予支持帮助的，显示了特别大的影响和作用的成为标志性的“贵人”。

且拿文学界来说，正是有着叶圣陶这样的“伯乐”，巴金这样的“千里马”方能横空出世。后来，巴金也成为“伯乐”，发现了曹禺这个“千里马”。古话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表明一个人虽有“千里马”的资质，如

果没有“伯乐”去发现,去扶持,也往往会被埋没。即使有些成功者,已经成为社会瞩目的“千里马”了,背后也仍然需要伯乐式“贵人”的维护与支持。比如,鲁迅创造的现代杂文文体,其思想艺术价值都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高标,但当时在受到肯定和赞扬的同时,也存在轻视贬低鲁迅杂文的现象。瞿秋白于1937年特意写了《鲁迅杂感序言》,深刻地阐述了鲁迅杂文的革命价值和它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使更多的读者认识了鲁迅杂文,有效地扩大了鲁迅的影响。鲁迅读了这篇序言后感到欣慰,赞赏“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鲁迅并产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一知己”,往往就是站在自己背后的“贵人”。

当代文坛上的名家,在成长发展的道路上,也多得到“知己”和“贵人”的支持。被贾平凹称为“应该建庙立碑”的汪曾祺,在成名前,作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深得沈从文的影响、教诲和提携,是沈从文引领他走上了文学之路。沈从文就是他的“贵人”。而当他于新时期复出后,也是由于得到“知己”及时的推荐和评介,得以冲破当时还飘散着的浓浓左倾迷雾,使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迅速为社会所认识。这其中,与他同是高邮人的评论家陆建华,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陆建华不像沈从文那样,是汪曾祺的前辈,而是后辈,其文学成就也不能与沈、汪比肩,但是,他具有极为敏感的文学神经,当汪曾祺于1980年10月发表了小说《受戒》后,他立即感到这篇作品为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当即率先加以评介,此后一直满怀热情地对汪曾祺进行跟踪研究。汪曾祺虽然在解放前出过一本小说集,但知之者甚少,解放后又长期被“封存”,他的90%以上的作品,都是写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九十年代初,当陆建华准备写《汪曾祺传》时,想找一些关于汪曾祺解放前和“十七年”时的资料,他走了京、沪、宁的许多知名图书馆,均无功而返。关于汪曾祺及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是随着汪曾祺在新时期复出而正式开始的。对汪曾祺的系统评介和

研究,陆建华是拓荒者,是第一人。陆建华的评介研究,不仅写了多篇文章,而且写了《汪曾祺传》和《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二书,还为汪曾祺整理了创作年表,策划了《汪曾祺文集》的出版,主持拍摄了关于汪曾祺的专题片《梦故乡》。此外,还参与策划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故乡高邮,帮汪曾祺圆了思乡之梦。在汪曾祺逝世后,又协助家乡高邮市,在文化胜地文游台建立了汪曾祺文学馆。陆建华是宣传评介汪曾祺最富贡献的人。因而有评论者说,“每一个汪曾祺的研究者难以绕开陆建华这个名字”。由于得到陆建华等人的推动和支持,汪曾祺及其作品的影响,不仅在空间上迅速得以扩大,而且在时间上能很好地绵延相传,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汪曾祺逝世后,他的作品仍在不断出版,由于读者欢迎,不愁销路,成为多家出版社争夺的香饽饽。

汪曾祺作品充满美和诗意,“天真隽永,自在风流”,按陆建华的说法,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一批以童年回忆为视角、致力于赞扬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人性美的作品,既把从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始,其后又因时代的、政治的因素被迫中断了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重新连接了起来,又为当时正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统天下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及时启示和加速推动了文学真正回归文学。自然,文学的花园是万紫千红、绚丽多姿的,不宜把汪曾祺风格的作品夸大为唯一的或最好的,但它却是一种特别富有个性色彩的文学之花,而长期来却受到不应有的粗暴地贬斥。陆建华正是基于对汪曾祺作品的热爱和赏识,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评介,促进了文学花园中这朵奇葩清香四溢,美了人间。

在交往过程中,陆建华和汪曾祺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俩是同道,又是同乡,心心相印,义气相投,很快地迈过初识时那种带有一定拘谨的来往,自由地随意地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创作、生活、家乡乃至内心的困惑烦恼,都能倾心相谈。汪曾祺从1981年7月17日,到他病逝前不到两个月的1997

年3月18日,十六年间先后写给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这些信件毫无遮掩地坦露了汪曾祺的性情追求和喜怒哀乐,为公开报道所少见,这是深入了解研究这位“文章圣手”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由于这些信写于社会急剧变化的新时期,内中涉及的一些情况和细节,也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富有价值的资料。现在,汪曾祺的三十八封信结集出版,作为汪曾祺“知己”的陆建华一一加以注释解读,这既为汪曾祺提供了一种别样的传记,也为我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私密性的材料,还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直面作家内心世界的读物。一个名作家能给一个评论家写这么多的信,受信者又能完好地将它保存下来,并精当地予以解读,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是一本具有文学传记、文学史料和文学阅读价值的书。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关于《私信中的汪曾祺》写作的札记及其他

—

1990年5月，我的文艺短论集《文坛絮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收选入我从大学读书时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作品。出于敝帚自珍的心理，我对这本书十分看重，全书定稿后，我没有多想就约请王干、费振钟两人为这本书写篇类似序的文章。请他们写序，首先是考虑到我们都是从高邮走出来的文友，他们对我从写作到日常生活都相当了解，也由于我很赞赏他俩在写作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初生牛犊精神。当时，这两人正处于合作的蜜月期，他俩联名发表作品，携手闯荡文坛。据了解，每有新的选题，他俩总是先讨论，然后分头执笔，署名在前的就是本文的执笔者。由此得知，为《文坛絮语》写的序，应是王干执笔。

王干很聪明，他对我也真的比较了解。他在执笔写的题为《评论的大众效应》一文中，特意写到我平时十分注意“利用各种空隙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的习惯。他说：“建华的资料工作在我们所见到的同行当中是几无可比的，他似乎有一种收藏资料的癖好，常常为少了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急得团团转，并四处搜寻。他家里的人和他的朋友们，暗地里常笑他的‘迂’

和‘痴’”。

王干在这里说得很形象,也符合事实。在收藏资料方面,我真的有点近于“迂痴”,如果说这就是癖的话,此癖让我终生获益匪浅。多年来,我发表在报刊上的许多文章和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如果少了丰富和厚实的资料支撑,那简直不可想象。即如我刚完成的这部书稿:《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假如我没有收藏的习惯,就不会把汪老生前写给我的总共三十八封信一一收藏好;而若是没有了这三十八封信,这部书稿也就成了空话。现在回忆汪老的文章很多,有的人只是和汪老说一两句话,甚至仅仅在某种场合远远地见到过汪老、并没有机会与汪老对话,还有的人得到过汪老的一本题名书、一幅字或画,就能写出洋洋洒洒的情文并茂的散文。坦率地说,这些文章中有一些采用的是基本写实和想象虚构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在高邮,汪老已成了人们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荣的热门话题,写与汪老交往的文章更多,但同一件事说法不一的情况也随之出现了,这中间的有些事我是知道的,我可以将真相大声地说出或写入文章中,之所以能这样做,有这样的底气,不因别的——

有信为证!

二

打从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开始,我就开始了对他的跟踪研究和资料积累。汪曾祺对此是知道的,更是支持的。他有新作发表了,新著出版了,总不忘尽可能地给我寄上一份。1996年8月,他应《江苏教育报》之邀,为该报写一篇回忆他多年前在幼儿园学习时、得到王文英老师母爱般关怀的散文,为此,他特地写信叮嘱我:“你写传记,可跟《教育报》要一份复印稿看

看，七十年前的幼儿园情况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见1996年8月23日来信）

正是因为得到汪曾祺的直接关心与具体支持，到目前为止，我已写了两本关于汪曾祺的专著，一本是1997年7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传》，另一本是2005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至于发表的关于汪曾祺的研究文章、散文、札记、随笔，那就更多了，我没有仔细统计过，总该有近百篇吧。上海东华大学一位女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相信每一个汪曾祺的研究者都难以绕开陆建华这个名字。”（柯玲：《陆建华及其〈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见《雨花》2006年4月号）她这样说，是对我的鼓励，也是我的荣幸。

但我知道，并不是人人都对我持有如柯玲一样的热情鼓励和真诚肯定的态度，有些朋友人前背后的某些闲谈传入我的耳中，我听后只是笑笑，从未对此作过解释。有时，有的事情说出了真相未必比不说好；而回答质疑最好的办法，是像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焦点访谈》广告词提倡的那样：用事实说话！比如，一再劝汪曾祺出文集的事，汪老从不想出，不愿出，到最后终于同意出，但却行动迟缓……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请看汪老自己在信中写的话吧：“我如果出文集，给江苏，并未‘另有打算’，你不必‘疑惑’”（见1992年7月26日来信）；“出文集事，很麻烦你，谢谢”（见1993年5月3日来信）。汪老的夫人施松卿在1993年4月26日给我的来信中则是这样说：“在你一催再催之下，曾祺已动起来了，开始编那四部文集。……我今天写这封信，目的是让你放心。要不是你一再来信，他的惰性还会在那里起作用。所以，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你，对吗？”

老夫人的这番话是对我的热情鼓励与充分肯定，让我每一想起便感动不已。

三

虽然我与汪曾祺同为高邮人,又,虽然我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从汪曾祺的胞弟汪海珊的口中,初步了解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成就并心存敬意,但真正与汪曾祺第一次见面,却是在八十年代初,并从此建立了密切的通信关系。每想起这一切,我就会自然地想到他在《关于〈受戒〉》一文中说的一段话:“试想一下: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

现实情况是如此相像:如果不是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汪曾祺会文坛复出吗?如果不复出,我会与他见面并建立经常的联系吗?都不可能的。

一开始,我与汪曾祺通信,双方都有一些拘谨。于我,是与一位久仰的名家通信,自然措辞谨慎;于他,是与家乡的一位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通信,虽然这个人与他的胞弟是同学,但毕竟十分陌生,这就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从他写给我的信的称呼上可以略窥一二。总共三十八封信的最初五封信,汪曾祺称我“陆建华同志”或“建华同志”,从第六封信起,他就改口直呼“建华”,这样的称呼一直保持到他写给我的第三十八封信,也即他生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将在新时期出的第一本书《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赠我,题字是“赠建华同志”,随着他在文学界的声誉蒸蒸日上,他的著作越出越多,在连续不断地赠给我的新著的题字上,再也不像赠我第一本书那样客客气气、一本正经地写“赠建华同志”,而是“赠建华”、“建华存之”、“建华藏本”,或“建华插架”……署名则一律为“曾祺”。那些题字都是写得龙飞凤舞,潇洒自如,生动地反映出汪曾祺欣逢盛世、重获创作自由后的愉悦心情。

消除了拘谨之后,汪曾祺在给我写信时完完全全地、放心地把我当成他

的可以信赖的小乡亲，甚至当成他的如汪海珊一样的小弟弟。他不仅通过写信与我交流情况，有了什么文艺方面的消息，他顾不上再作核实，就先写入信中告诉我；他遇到什么烦恼事，也在信中向我讲。这样，私信中的汪曾祺就呈现出人们平时从公开报道中不易看到的常人的一面，其喜怒哀乐，一如平民百姓。曾有一度，他因为不可能全面了解家乡的有关情况，或所听信息有误，对家乡领导颇有微词，这些话不便对别人讲，就只有在信中对我倾诉。尽管这样，家乡要求他做什么事，他说：“我是无不从命的”。不过，事情虽做了，心中的郁闷难除，他甚至想过“与他们还是保持一段距离”。可是，他转念一想：“我如果到南京、镇江、扬州，而不到高邮，过门而不入，他们也会觉得难堪。”左思右想，他拿不定主张了，于是在信中问我：“如之何？如之何？”（见1986年9月23日来信）

汪曾祺在写给我的信中，谈得最多的是创作，他在最初想写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时，可谓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几位师友都劝他别写，说很难写，而他在写给我的信中却雄心勃勃地说：“但我要姑且试之。”（见1983年9月8日来信）到了真正动手时，他发现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向我坦露了难度所在：“《汉书》、《史记》许多词句，看看就过去了，认真起来，却看不懂”。他原先想先搞出有关司马迁的部分，题目都想好了，叫《官刑》，还准备把这篇作品交刚创办的《中国作家》发表。后来却没有写成，是他自己知难而退，原因还是心中无数。他老老实实地在信中写道：“这官刑就很麻烦，成年人的生殖器是怎样割掉的，我就弄不清楚。”（见1984年8月16日来信）

汪曾祺于1981年7月17日给我写了第一封信，1997年3月18日给我写了第三十八封信，写好这最后一封信后的两个月（5月16日）他就因病猝然去世了。从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其时间跨度长达十六年。这十六年间，汪曾祺从冬眠文坛四十年，到在新时期和暖春风吹拂下欣然复出；这十

六年间,他和他的作品从不为人知,或仅为少数人知,逐渐成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一辈子钟情于文学,却又一辈子饱经劫难的汪曾祺自己,终于幸运地迎来他自己的创作辉煌期;也是这十六年间,中国当代文学挣脱多年来的“左”的束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多方探索、广泛竞争、百花齐放的新时期。毫无疑问,汪曾祺在这十六年间写给我的三十八封信,首先是私密性的,他无意在信中为时代留影,但由于这些信是写于当代中国从政坛到文坛都正处于风起云涌、天翻地覆、史无前例的变化着的新时期,这样,虽然是最具私密性的两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却于字里行间不经意间为时代、为社会留下远不仅是蛛丝马迹的生动细节和史实,为后人了解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社会的真实面目提供了饶有情趣、不无价值的佐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十八封信就清晰地显示了汪曾祺在新时期从多年冷寂到走向辉煌的全过程,简直成了又一部从特别角度写就的关于他自己的特别的传记,这部特别的传记也自然地为新时期的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

如果要写出三十八封信的关键词,应该是:故乡高邮、年表和文集、名誉案。

不久前,一位记者就我与汪曾祺的交往这个专门话题采访我,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做那么多与汪曾祺老师有关的事呢?

这个提问很直白,也很坦诚。我明白,隐藏在她这个提问后面,她(可能还有不少人)真正想知道的是,几乎从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开始,我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忙着做了许多有关宣传评介汪曾祺方面的事情的真正

原因。

先是参与策划邀请他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故乡，帮他圆了思乡之梦；

后来主动为他整理创作年表；

又一再劝说他出文集；

再后来，主持拍摄了关于他的专题片《梦故乡》，这个专题片如今已成了唯一记录汪曾祺生活与创作的影像资料；

更连续不断地写了许多关于他的论文、散文、札记；

而当汪曾祺去世前突然卷入《沙家浜》名誉案官司，一开始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他自己因此正苦闷莫名时，我却主动“跳”出来帮着说话，以至自己也成了被告……

我的这一切言行，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对一名作家的跟踪研究的范围，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里，或许用得上毛泽东说过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乐于长期为宣传汪曾祺尽心尽力，当然绝非出于无缘无故的偶然，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最初，我真的完完全全是被汪曾祺的“文”所吸引。

汪曾祺看似平平常常实质坎坎坷坷的一生，无不与“文”有关，他的爱好，他的终身追求，都离不开一个“文”字。

他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在得过“拔贡”功名的祖父和琴棋书画均颇精通的父亲的教育之下，小小年纪就领略到中华文化之美。高中学习阶段，抗日战争爆发，他又不惜长途跋涉赶到昆明报考上了西南联大中文系。他说，虽然此举“有点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汪曾祺：《自报家门》）。就是说，他是为“文”才千里迢迢奔向西南联大沈从文的身边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一解放，汪曾祺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

其目的不是借此博取功名，而是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经验，写一点刚劲的作品”（汪曾祺：《自报家门》），换句话说，他一腔热血从军的目的就是想以文报国。

到后来，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他认清自己的文学追求很难为当时的主流文体所接受，就只好收起笔隐身于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部里暂不为文。

接着，“文革”前后，他身不由己地被召入“样板戏”创作组，还是因为“文”。

.....

就这样，汪曾祺一生为文吃了那么多的苦，历尽磨难，却又都因政治的、社会的原因难以畅所欲言。眼看自己已年近花甲快红日西沉，却到底盼来政通人和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是汪曾祺一生不幸中的大幸。从此，他心情舒畅地、放开手脚为文终其一生——从文坛复出到他去世的短短十六年间，他写下的作品，竟占其一生创作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汪曾祺的一生是为“文”奋斗一生，他此生的最大成就也就在于他能在“文”的领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新时期刚开始，当中国文学终于挣脱长期以来的“左”的桎梏开始一个新的里程、却又一时不能完全摆脱文学为政治中心服务的旧的轨道时，是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一批以童年回忆为视角、致力于赞扬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人性美的作品，既把从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始，其后又因时代的、政治的因素被迫中断了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重新连接了起来，又为当时正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统天下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及时启示和加速推动文学界让文学真正地回归文学。虽然这一切，未必是汪曾祺有意为之，但客观上的确起着这样扭转创作风气的作用，功莫大焉。

当人们看清了这一切，对汪曾祺赞赏有加时，他却说：“我们当然是需